

中國文哲論集13】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下

主編●楊晉龍
執行編輯●陳淑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中國文哲論集⑬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下)

主 編

楊 晉 龍

執行編輯

陳 淑 誼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

2000年10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論集⑬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主 編 楊 晉 龍
執行編輯 陳 淑 誼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 27883620

印 刷 者 辰 益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永和市竹林路201巷24弄8號2樓
電話：(02) 29280954

定 價 精裝本（上下兩冊） 新臺幣 820 元
平裝本（上下兩冊） 新臺幣 720 元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初版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再版

ISBN 957-671-723-X （精裝）

ISBN 957-671-724-8 （平裝）

目次

上 冊

出版說明	1
目次	3
導言：元代經學史的奠基與新猷	楊晉龍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Curriculum Between 1250 and 1400 and the Rol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lassical Studies ----- Benjamin A. Elman (艾爾曼)	23
南宋至明初科舉科目之變遷及元朝在經學歷史 的角色	艾爾曼著、呂妙芬譯 71
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	夏傳才 119
經學家許衡——其思想的特質	福田殖著、連清吉譯 145
元代《易》學平議	黃沛榮 159
胡方平、一桂父子對朱子《易》學的詮釋	鍾彩鈞 195
吳澄的《易》學	詹海雲 237
吳澄《易》學研究——釋象與「象例」	楊自平 269
董真卿《周易會通》在「復古《易》運動」中的意義	許維萍 305
吳澄的《尚書》學述要	蔡方鹿 337
王充耘的《尚書》學	蔣秋華 363
論陳樸《書解折衷》與《書蔡氏傳纂疏》對《書集傳》的態度 ——駁正《四庫全書總目》的誤解	許華峰 395
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對蔡沈《書集傳》的疏釋	陳恆嵩 425

下 冊

元代《詩經》學初論	張宏生	453
劉瑾《詩傳通釋》淺說	趙沛霖	469
《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係再探		
——試析元代《詩經》學之延續	楊晉龍	489
〈冬官〉未亡說之流行及其意義	小島毅著、連清吉譯	539
評元代吳澄對《禮記》的改編	姜廣輝	559
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	張高評	579
趙沅《春秋金鎖匙》初探	馮曉庭	625
黃震の《四書》學	神林裕子	659
黃震的《四書》學研究	神林裕子著、張文朝譯	685
元儒陳天祥對《四書集注》的批評	林慶彰	705
許謙《讀論語叢說》序說	廖雲仙	721
朱熹至元儒對《大學》的解釋及所謂「朱陸合流」問題	金春峯	761
陶宗儀《說郛》百卷本流衍考		
及其讖緯輯佚之文獻價值評議	黃復山	795
附錄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837

元代《詩經》學初論

張宏生*

宋代理學經周敦頤、二程以迄朱熹而集其大成。朱熹之學在其生前雖曾遭到朝廷禁毀，但至理宗朝就已受到推崇，不僅屢有追贈，更于淳祐元年（1241）從祀孔廟，標誌著理學的地位事實上已經確立。而元朝代宋以後，朱學備受尊崇，不僅體現在朝廷的政治文化思想上，如延祐年間復開科舉，即基本上以朱學為考試之本；而且體現在與此相關的學術研究上。縱觀元代學術，大體上被朱學所籠罩，這是一個朱學大為昌明並得到發展的時代。

元代的學術授受，全祖望的《宋元學案》言之已詳，朱學數傳，非常清晰，但此書跨度很大，包羅廣泛，專就朱學而言，尚不集中。《元史》辟有〈儒學傳〉，將以經藝專門和以文章名家者合而傳之，共得 43 人，其中明言為朱熹再傳弟子或為學尊奉朱熹者即達 22 人。應該指出的是，餘下的 21 人或以文章知名，或僅為他人傳後所附，事跡不詳，如胡之綱和胡之純皆為胡長孺從兄，附其傳後，生平甚簡，所以，〈儒學傳〉中所列舉的 22 個與朱熹有關的學者，應該視為元代儒學發展基本風貌的體現。

從元代的經學著述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四庫全書》所收元代經學著作，其中大部分皆淵源程、朱。至於《詩經》著作，凡七種，分別

*張宏生，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爲許謙《詩集傳名物鈔》（以下簡稱《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以下簡稱《通釋》）、梁益《詩傳旁通》（以下簡稱《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以下簡稱《會通》，按此書實歷經朱公遷、王逢、何英三手而成，源頭出於朱氏，援《四庫》例，置於此）、①朱倬《詩疑問》、劉玉汝《詩續緒》、梁寅《詩演義》（按梁氏實爲明初人，援《四庫》編例，仍置於此），②則都是傳承朱熹《詩集傳》的。元代的《詩經》著作並不僅限於這七種，但舉以爲例，基本上也可以反映出元代《詩經》學的狀況。

本文即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的七種《詩經》著作爲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本，收入第76、77二冊），對元代的《詩經》學略事探討。

二

元朝是以西北少數民族的蒙古入主中原，進而取代漢族政權，統治天下。《詩經》中有若干篇涉及民族問題的詩篇，多與所謂「夷狄」內侵有關，《詩集傳》參考前人成說，已經一一爲之指明。在元代這種特定的背景中，那些秉承朱學的經師，當他們治《詩經》時，能否還敢堅持並發揮其中一以貫之的民族思想？答案是肯定的。考其所論，大約有以下三種情形。

第一，對《集傳》內涵作進一步申述。〈小雅·采芣〉有「靡室靡

①關於《詩經疏義會通》的成書情形，詳見楊晉龍：〈《詩經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所論，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317—346。

②有關梁寅生平及其與《詩演義》差異等問題，可參楊晉龍：〈《四庫全書總目·詩演義提要》問題探究〉，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181—197。

家，獫狁之故。不遑啓居，獫狁之故」之語，《集傳》：「獫狁，北狄也。」許謙《名物鈔》更引《史記》曰：「虜虞以上有山戎、獫狁（按即獫狁）、葷粥，戰國後爲匈奴。」眾所周知，匈奴自秦漢以來，連年爲中國之患，其族散居於大漠南北，而蒙古族正興起於彼。考其淵源，應有聯繫。許謙以匈奴釋獫狁，無疑有一定的言外之意。又如〈小雅·六月〉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之語，《集傳》：「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劉瑾《通釋》引嚴尤曰：「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毆之而已。」較之《集傳》，明顯增強了感情色彩。而朱公遷《會通》更引《詩解頤》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所有這些，都是在《集傳》的基礎上，作了符合當時形勢和人心的進一步發揮。

第二，對周室「中興」一事，深致感慨嚮往。獫狁內侵，國家多難，而經宣王中興，周室再振，這歷來是國勢衰微、尤其是改朝換代時知識份子所津津樂道，並衷心嚮往的理想。元代漢族知識份子所面對的是中國政權第一次被一個少數民族全面接管，這時想起周室抗拒了異族的侵擾，仍然能夠中興，心中不免有著複雜的感受。如〈小雅·六月〉，《集傳》未及「中興」，而《通釋》先引輔廣語曰：「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卻獫狁以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言吉甫之行師，真是以繼南仲之軌跡矣，宜宣王之中興也。」復於下章申論之：「《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獫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獫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又〈大雅·江漢〉一詩，《通釋》以《集傳》言未盡意，復引嚴氏之論云：「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

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又引楊氏曰：「聖王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

第三，闡發遺民心志。元兵滅宋以後，不少宋遺民堅持志節，不與新朝合作。他們有的隱居不仕，寄意恢復；有的則在學術著述中寄託自己的「春秋大義」。謝枋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謝枋得號疊山，與文天祥同榜進士。德祐元年（1275），呂文煥導元兵南下，一路望風披靡，謝枋得堅守孤城，誓死抵抗，終因寡不敵眾，一敗再敗，遂隱於江湖之中，著述自遣。謝枋得在當時聲望甚隆，元朝統治者曾先後五次徵召，都被他拒絕。至元二十五年（1288），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將他強行押解北上，他遂一路絕食，慷慨赴死。作爲一個民族氣節極強的亡國遺民，謝枋得把自己的感受不僅寫在創作中，而且體現在學術研究中。他的〈和遊古意韻〉一詩這樣寫道：「無志何勞悲離黍（自注：〈離黍〉一詩忠矣，然略無興周之志），得仁更不食山薇。儒冠有愧一廝養，何忍葵心對落暉！」^③他對《詩經》中〈離黍〉（按應爲〈黍離〉）一詩的批評，說明在那種特定的形勢中，他的學術研究是別有用意的。他的《詩傳註疏》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寫的，而元代的知識份子對他的那些論述顯然別有會心。如〈秦風·無衣〉，《通釋》引謝語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尙異於列國也。」又《王風·黍離》，《通釋》引謝語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仇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

③〔宋〕謝枋得撰：《謝疊山先生文集》（〔清〕咸豐庚申年署弋陽縣事章永孚補刊本），卷1，頁17。

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於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幽王為犬戎所殺，是一向以嚴夷夏之大防的正統知識份子所深以為恥之事，如果聯想到元兵破宋，擄掠三宮北上，崖州海上逼死宋朝最後的小皇帝，就會承認謝枋得反復提及這件事，當是有感而發，而元代諸儒引述謝氏之論，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此外，如〈大雅·瞻印〉「天何以刺」一章，《集傳》曰：「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通釋》引輔廣語進一步發揮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此其所以淪胥於滅亡也。」南宋王朝之君，居於偏安之地，不僅生活荒淫，以致浮靡之風浸淫整個社會，而且往往任用奸佞之臣。元代諸經師追懷古事，想到宋朝滅亡的原因，不能不有感於心。而仔細考察起來，這種感情與朱熹一貫對民族氣節的提倡，也不能沒有關係。

三

南宋淳熙以後，學界雖然崇尚朱熹，但朱學還不能完全佔據統治地位，如林岳《毛詩講義》，大都「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可謂篤信謹守矣」^④。但到了元代，朱學成了一統天下。因此可以說，元代是對朱熹《詩經》學進行初步總結的時期。

④〔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毛詩講義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浙江杭州本），卷15，頁124。

《四庫全書》所收元代的七種《詩經》學著作，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和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等三種都首列〈詩傳綱領〉（許、朱但題「〈綱領〉」）。這雖然主要是繼承了宋代朱氏後學輔廣等人的發明，^⑤但在元人手中仍然賦予了新的內涵，反映了學者們對《詩集傳》的主要內容及其精神實質的看法，涉及讀詩方法、賦比興、〈風〉詩定義、文學特徵等朱熹研討《詩經》的精要之處，並貫串於全書之中。今略加申述如次。

第一，關於讀《詩》方法。讀《詩》方法的變革是朱熹在《詩經》學史上的重大貢獻之一。他曾闡述自己的看法：「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⑥朱熹的這一做法，衝破了《毛詩正義》的束縛，為《詩經》的研究開闢了更為廣闊的道路。〈詩傳綱領〉引孟子「以意逆志」之說，張載「置心平易」即「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之說加以說明，從這個基本立場出發，元人更示以具體途徑。如許謙《名物鈔》卷一引朱說：「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終無益。」又如劉瑾《通釋》引朱子之論云：「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在這個問題上，元人從觀念到方法，都作了全面的體認。

第二，關於賦比興。對於這個問題，朱熹的貢獻在於將《毛傳》以

⑤按宋代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首亦列〈綱領〉，但自成另一體系。宋代朱鑑編《詩傳遺說》卷1亦有〈綱領〉，儘管意在發明朱《傳》，但與輔氏有所不同，而元人則基本上都是沿襲輔氏的。

⑥〔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80，頁2068。

來的興即比喻之說推翻，強調了「興乃興起之義」；^①其次，他創造了賦比興的兼體說。元人很敏感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幾乎彙輯了朱熹在這一方面的全部論述。如劉瑾《通釋》引述說：「說出那個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個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遊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興體。」又：「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劉玉汝《詩續緒》更是全面討論了這一問題，涉及兼義之說，取義之興和無取義之興等許多方面，容後詳之。

第三，關於「風」。對風詩的理解，也是朱熹和傳統《詩經》學的重要不同之一。《毛詩·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故謂之風。」鄭玄的風土之說與此一脈相承。但考察其基本含義，對「風」的理解仍不出「風化」、「風刺」之類，漢唐儒生，大較如此。朱熹的學說雖然和《毛詩·大序》及鄭《箋》有一定的淵源，但更主要是創新。《詩集傳·序》：「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詩集傳》卷一釋「國風」：「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詩傳綱領〉也突出了這一點，許謙《名物鈔》引朱說直釋為民歌，所謂「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而劉瑾《通釋》也引朱說總結為：「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可見，對朱熹這一驚世駭俗之說，元儒不僅認同，而且讚賞。

朱熹的《詩經》學，反映在〈詩傳綱領〉中的，尚不止於此，以上僅略作示例，以見元人研朱心得。

吳師道序《詩集傳名物鈔》說：「自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

①〔宋〕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本），卷40，頁34。

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一正于夫子而制定，再正于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其實，這一段也可以看作對整個元代《詩經》學的描述。元代的《詩經》學，主要就是想從不同方面揭示出《詩集傳》的價值。這又可以從幾個不同方面看出來。

其一，列舉成說，相互對照。《詩集傳》離《序》而言詩，自出手眼，開闢解《詩》新路，確實非同一般。但前人已經指出，朱熹往往「陽違《序》而陰從之」。^⑧雖然在朱熹心目中，《小序》既是世儒之談，則就既有荒唐之處，又有合理之處，全疑全信，都是偏頗，但不作說明，畢竟使人生疑。可能是有見於此，元人往往將各種說法列出，使人見出朱熹的所是和所非，實際上有爲《詩集傳》填空的作用。如劉瑾《通釋》在每一篇詩後，都列出《小序》，有時默認朱說，有時闡發朱說。列出《小序》的本身，就能夠使讀者對哪些是朱熹的創造，哪些是其對前人的沿襲一目了然，因而也就能更深入地理解朱著的價值。

其二，朱熹敢於簡化註疏，令人耳目一新，但引用前人之說，往往並不注出，有時甚至語焉不詳，元人於是一一爲其補上。如〈小雅·六月〉「元戎大殲」句，《集傳》：「元，大也；戎，戎車也。」劉瑾《通釋》：「《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漫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⑨戎。』」又如〈小雅·十月之交〉，關於「四分度之一」和「正陽之月」，朱《注》甚略，梁益則將其出處全部找出。又如〈氓〉：「至於頓丘。」《集傳》：「頓丘，地名。」未說在何

⑧〔清〕姚際恒：《詩經通論·自序》，載林慶彰主編：《姚際恒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冊1，頁15。

處。《通釋》：「王氏曰：『在朝歌之東。』」〈緇衣〉，《集傳》：「緇衣，卿士大夫居私朝之服也。」《通釋》：「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韋是也。卿士朝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還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又如〈小雅·斯干〉：「似續妣祖。」《集傳》：「似，嗣也；妣，先于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會通》坐實「或曰」爲「曾氏」。這一類的增釋，一方面可使讀者瞭解得更爲具體，另一方面也是想說明朱熹的綜合取捨能力。

其三，朱熹作注雖然時有交待，但若不發揮，則可能不明就裏，元人於是爲其補充，以坐實朱意。如〈周南·漢廣〉，《集傳》：「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通釋》：「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這是以後例前。又如〈氓〉，《集傳》：「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唯）以貞信爲節。」《通釋》：「愚按《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這是接著朱熹的話題去說，更詳細地駁斥鄭玄之非。凡此均將《集傳》闡發得更爲明確。

其四，朱熹不僅把《詩經》看作一部偉大的經學著作，而且看作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對後世影響深遠。元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作了發揮。如〈周南·芣苢〉，朱《傳》：「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會通》何英《增釋》引元人吳師道語：「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這就對詩歌之所以感動人的特質作了闡發。事實上，元人對《詩經》的批註，已經很像對一般詩文集的做法，如談章法、句法、段意、作法等。而對某些問題的討論，也有特殊貢獻。如許謙討論比興，即引述朱說，認爲興較之於比，

意味更長，所謂「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這一說法，在清代陳廷焯的著作中得到了回應。陳氏《白雨齋詞話》卷八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台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沂孫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托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意。若興則難言之矣。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復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雲庭陰」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雖然不能完全比附，但對比和興本質的體認，卻有相通之處。又如〈小雅·車攻〉「蕭蕭馬鳴」一章，朱公遷《會通》評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遍，即此章可知。」考之宋代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二者應有淵源。如果說元人研《詩》已經注意到從詩話中獲得資料，那麼他們確已表現出了較大的開放性，不過對這個問題，還應作進一步的研究。

元人借鑒輔廣的〈詩傳綱領〉，但猶以為未備，於是劉瑾作有〈詩傳外綱領〉，計分「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四項。餘三項可存而不論，其「音韻」猶有可說者。朱熹很重視自己所提出的叶韻說。《朱子語類》卷八十：「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又卷八十一：「器之間《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所以他在《集傳》中論〈關雎〉一詩說：「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又曾更具體地申述說：「〈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

讀詳味，不可說。」^⑨從音韻學來看，宋代吳棫發明的叶韻說不盡符合古音實際，元代劉玉汝《詩續緒》卷一就已提出此點：「吳氏《補韻》以正音爲叶韻，則是以後來之俗音爲古人之正音，豈其然哉！」朱熹所論，也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清初顧炎武、今人王力都有所論列，但朱熹強調這一點，一方面，從對作品的玩味出發，可以得出自己的見解；另一方面，這也是抓住了詩的文學特質的基本要求。所以叶韻說的提出，也是朱熹《詩經》學的一大特色。劉瑾敏感地指出這一點，應是深思有得之言。許謙《名物鈔》論及〈邶風·柏舟〉時所謂：「讀詩者，每於一詩吟哦上下，優遊涵詠，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也是發明這一層意思。另外《會通》在〈詩傳綱領〉之後，列有《詩傳大全》鈔錄劉瑾《通釋》和元人羅復《詩集傳音釋諸圖》而成的〈詩經大全圖〉，^⑩涉及天文地理、器皿服飾、宮闕器樂等，尤以〈思無邪圖〉、〈四始圖〉、〈正變風雅之圖〉、〈詩有六義之圖〉等，能以列表的方式，發揮朱學。如論「賦比興兼義」，詳列「賦而比」、「賦而興」、「興而比」、「比而興」、「賦而興」、「賦其事以起興」諸類，各實以例證，並以朱熹所述爲之詳解，這就使得讀者一目了然，易於入門。

四

元代的《詩經》學雖然以發明朱《傳》爲主，但並不意味著只有因襲，沒有開拓。由於已經經過了幾代人的積累，對朱學流播過程中的各種情況不斷總結，特別是考慮到讀者的接受需求，元代《詩經》學在承繼朱

^⑨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同註⑥，卷81，頁3094。

^⑩有關〈詩傳大全圖〉來源問題，參見楊晉龍〈《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同註①一文所論。

學的前提下，也作了符合時代的發展。

第一，以朱學為主線，進一步折衷各家學說。從《詩集傳》的注釋體系來看，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宋以前《詩經》學的成果，雖然以批判為主，但是是非非，擇善而從，表現出集大成的氣度；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宋以來《詩經》研究的成果，經常徵引宋代研《詩》有成者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轍、程頤、張載、楊時、呂祖謙、鄭樵諸人之說，發揚並深化了宋代經學的獨立思考精神。以上兩點，在元人著述中都有體現，但卻並未墨守。首先，元人對漢代諸家《詩》都給予了一定的注意，根據不同情況，選擇不同的解釋，尤其是涉及考訂部分，往往有意彌補朱子所未及或偏失，因而初步體現了將漢代之考據和宋代之義理加以結合的傾向，對後來某些清儒的漢宋並重之說，無疑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如王應麟《詩地理考》和劉瑾《通釋》都每引韓《詩》，前者見於〈鄭風·溱洧〉諸篇，後者見於〈小雅·六月〉諸篇。其次，特別注重吸收宋代對《詩集傳》的研究成果。南宋末年，由於《詩集傳》獨特的解《詩》方式和敏銳的思想鋒芒，一時研《詩》者多受其影響。同時更由於朱熹崇高的學術地位，後學眾多，所以發明《集傳》之作也極多。元人研《詩》，既多朱學一脈，因而無不注意發掘這一份資源。以劉瑾《通釋》為例，歐陽修（著有《本義》十六卷）、蘇轍（著有《詩集傳》二十卷）、輔廣（著有《詩童子問》，《宋史·藝文志》題作《詩說》）、嚴粲（著有《詩緝》三十六卷）、曹粹中（著有《詩說》三十卷）諸人之說，就常為其所用。不僅如此，有些人在歷史上主要並不以經學見重，如謝枋得、劉辰翁等一些文學之士論文之語以及不少不甚知名之士的意見，也常在劉著中出現，這就顯得非常開放。^①這說明，由於《詩集傳》的示範作用，《詩經》研究的層面更加多了，元人已經開始有了比較多元的眼

①劉瑾《詩傳通釋》引錄宋元學者諸說之實際情形，詳見楊晉龍：〈《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係再探——試析元代詩經學之延續〉一文所統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1998年12月23日發表。